

课程思政背景下新一代高校外语教材 开发的思考

蔡基刚

(上海外国语大学 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摘要: 在课程思政背景下,一些大学英语教材被进行了二次开发,主要突出国家意识、中华文化和中国故事,目的是改变原来外语教材主要介绍西方文化、历史、社会、科学和技术等内容和原汁原味语言的做法,转而挖掘中国文化,以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国家立场的认同感。这一做法有一定意义,但这不仅改变了高校外语教材的传统编写模式,也几乎改变了学习外语的目的和性质。我们认为,无论从课程思政的立德树人角度,还是基于国际传播的双向功能,外语教材都应选择西方的文化、历史、科学和技术知识作为主要内容。这是由外语学习的目的决定的,即不仅要让学生学到原汁原味的外语,还要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提高国际理解力和国际胜任力,同时满足专业学习和未来工作的需要。

关键词: 外语教材;课程思政;中国文化;国家意识;国际传播;国际理解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65X(2024)3-0029-07

1 引言

我国高校的外语教材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发展,每一代都有各自的特点(李荫华,2001;黄林,2005;陈坚林,2007;蔡基刚、唐敏,2008;蔡基刚,2023a)。但不管是打基础为目的的通用英语教材,还是为满足专业学习需求的学术英语教材和专门用途英语教材,教材的内容一般都是以语言对象国的文化、文学、社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作为语言学习的载体,反映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内容相对较少。但在课程思政背景下,新一代的外语教材编写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作者简介: 蔡基刚,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对比语言学、外语教学

最近一些出版社纷纷进行课程思政背景下外语教材的二次开发,主要是通过修改原教材,新增思政版块,增加体现中国元素,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内容,甚至还开发了“理解当代中国”多语种系列教材。王晓莉和胡开宝(2023:9-10)指出:“在课文内容选择上,教材融入反映中国元素,尤其是中国社会巨大进步的相关人物或事件”,“使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树立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并学会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卫昱(2023:58)在讨论新版大学英语教材时说:“在英语教材设计中要融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介绍,把这类内容融入选材和各类活动设计当中,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文化自信。”如在第二册的思政附录中开辟了“中华文化”专题,以中英双语介绍中国传统节日、京剧、茶文化、水墨画、中医、苏州园林、汉字、儒家思想、二十四节气、生肖、书法、中国民间艺术、围棋、八大菜系、中国武术、唐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思政元素融入语言素材当中,让学生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热爱,学会用英语向世界介绍中国。对于如何看待在大学英语教材中大量增加中国文化元素,本文从立德树人、国际传播、国家意识和外语学习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2 立德树人:课程思政的核心

什么是课程思政?课程思政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又如何体现在外语教材中?从目前的外语课堂教学和教材使用以及相关文献看,这些概念并不清楚。比较普遍的观点就是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宣传爱国主义(杨金才,2021)。增加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等内容就是最普遍的做法。但是查阅所有关于课程思政的中央文件,我们并没有发现课程思政的内容是传播中华文化。2020年6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主要是“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反复强调高校要“坚持立德树人”,“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坚持以德为先”和“完善德育评价”。可见,课程思政的核心是立德树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反复强调要“教育引导学 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立德树人与自身道德素养的提高有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如果说前16个字是国家和社会层面的目标,后8个字就是在个人层面的要求,这就是立德树人的主要内容。立德树人要求做到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尊重他人、宽以待人、善良慈悲、谦虚正直。也就是说,立德树人和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并没有直接关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8个字体现的是人类文明的精髓和共同价值,超越了意识形态、社

会制度和国家文化（蔡基刚，2021a）。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培养具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的核心内容。如果以这一点为标准，可以将体现这8个字的素材编入外语教材。

这8个字体现的美德在西方文化中同样普遍存在。西方的文明和价值观是人类文明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爱大德”冲破了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限制。西方作品中有许多展现底层民众的质朴、正直、善良、爱心和坚毅等人性之美的内容，完全符合我们立德树人的要求，为什么不能选入我们的外语教材中？

3 国际传播：双向交流与传播

我们认为，利用教材增强学生的国际传播能力，学会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国际传播是双向的，英语作为世界通用的交流工具可以用来进行跨文化交流，我们不能在外语教材中只讲中国故事，而不讲外国故事，不传播外国声音，更不能把学习外语的主要目的片面理解为讲好中国故事。“我们需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我们同时需要了解世界文化，这并不矛盾。”（蔡基刚，2021b）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发展和进步没有哪个领域离得开西方科学、技术、经济的影响，也得益于西方政治和文化的输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西方政治理论。自辛亥革命以来，西方政治、法律和文化的输入促进了中国从一个封建专制的社会向民主共和的社会发展。当时人们欢迎来自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中国现代司法体系，如律师制度和庭审辩论等也是从西方引进的，改变了中国司法的讯问思维方式（蔡基刚，2021b）。学术文化催生了生命学科的各级伦理道德委员会的成立，要求研究者在涉及动物和人体试验时必须得到这个委员会的批准。即使采取访谈方式，也需要被试者签署相关调查知情书等。这些做法也是借鉴于西方。

2023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上强调：“我们要深化交流互鉴，以包容的胸怀构建和而不同的精神家园。……用欣赏、互学、互鉴的态度对待多种文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谱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就是抛弃政治意识形态，强调对世界各国文化的尊重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了《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泰坦尼克号》《指环王》《神秘的黄玫瑰》《简爱》《茜茜公主》《叶塞尼亚》《尼罗河上的惨案》《佐罗》《望乡》《追捕》《人证》《血疑》《流浪者》《大篷车》等一大批国外影片，其反映的伦理道德价值感动和影响了一代人。如果错误地理解文化自信和国际传播，只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理解当代中国，这些外国影片能进入中国吗？

要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就要求我们,尤其是大学生具有国际理解力(不同国家、文化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和国际胜任力(多语言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的能力以及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的能力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要求学校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如果不传播国际声音,不了解世界文化,如何以“欣赏、互学、互鉴的态度对待多种文化”?只有理解当代世界,了解西方人如何看待世界,清楚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如他们对人权、民主、自由和公正的看法,才能正确应对价值观的世界挑战,“深化交流互鉴,以包容的胸怀构建和而不同的精神家园”。因此,有什么理由不能在外语教材和外语课堂中传播西方文化,讲西方故事?只有了解语言对象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才能在交往中取得主动,获得话语权。

要对一个事物有全面的了解,必须有一个参照物。只有通过同类事物的比较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也就是说,文化自信是基于对世界各国文化的充分了解,只有充分接触世界文化,才能加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和传承。没有接触,没有对比,没有跨文化交际,只提倡理解当代中国,不鼓励理解当代世界,将会导致盲目自信。在人工智能、高端芯片、光刻技术、医疗器材、科研仪器、精密机床、航空发动机、生物医药、化工产品甚至农业技术等方面我们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许多误解、隔阂、夜郎自大和信息不畅通有关。真相是来自不同信息的比较和分析。‘不信谣不传谣’的前提是公民必须能够首先分辨和确定某个信息是否是谣言。如果只可以通过一种语言了解,只有一种信息渠道知晓,我们就很难有一个比较接近真相的认知。”(蔡基刚, 2021b)

4 国家意识:对爱国主义的理解

在课程思政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外语教材中要体现国家意识理念(陈新仁、杨金龙, 2021; 杨枫, 2022)。杨枫(2022: 94)认为:“注重外语教材的国家意识”“就是坚持外语教育的爱国主义”,“彰显外语教材的社会主义价值指向、内容表征,通过挖掘母语文化的禀赋,以投射和再造的方式让外语教材闪耀着国家意识的光辉”。因此,在外语教育中引入国家意识就是加强学生对中国的“历史认知、民族认同、文化意识、国家立场以及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的认识(杨枫, 2022: 94)。杨枫(2022: 92-94)曾批评我国传统的外语教育和教材编写:“我国外语教育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一直以语言的工具性和价值无意识切割着中国文化”,“在外语教育政策和外语教学实践中,国家意识缺席,中华文化赤字”,“追求教材的原汁原味而大面积实施原版化教材”,“造成新一代外语学子因缺乏中华文化的代际传承而在自由主义、精致利己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价值潮流中载沉载浮”,

而“这无疑是外语教育面临的国家意识时代困境”。

我们认为，外语教材应该体现国家意识，但不是简单地在教材中直接加入反映爱国主义、政治立场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内容。把教材选材提高到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似乎混淆了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关系，即政治课与外语课的关系，两者有很大差别。如果把国家立场、政治意识和爱国主义作为外语教材的选择标准，那基本上就排除了有关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内容，否定了跨文化交际的必要性，也就排除了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力和国际胜任力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很难判定介绍西方文化和科技的课文是否与宣传爱国主义有冲突，或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情感？外语教材要体现国家意识，坚持政治立场，那么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教材的课程思政要如何体现爱国主义和政治立场，是否也应该以中国元素为主，不介绍西方的数学、化学和医学知识。例如，南丁格尔被国际医学界广泛誉为“提灯女士”和“克里米亚的天使”，她的生日5月12日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无数医护人员在南丁格尔精神的鼓舞下积极抗疫，全国成立了609支南丁格尔医务志愿服务队。如果考虑到她是英国护士，所救护的英军士兵参加的战争是非正义的（英法与俄国为争夺小亚细亚地区的控制权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英国侵入了俄国领土），她的事迹是否就不值得歌颂，不能选入外语教材，因为用国家意识来衡量，宣传一名为进行殖民扩张的英军服务的护士很可能偏离了政治立场。

“彰显外语教材的社会主义价值”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谱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并不矛盾。爱国主义不是空洞的说教和口号，而是体现为在平时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努力进取，勇于担当，遵纪守法。华为为什么是科技产业的领军企业？这和他们的爱国主义理念有关。华为高级副总裁陈黎芳在一次员工大会上说：“我们要正视美国的强大，看到差距，坚定地在美国学习，永远不要让反美情绪主导我们的工作”，“全体员工要有危机感，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真正爱国爱民，为民族争光争气，唯有学习加实干”。

5 外语学习：学习目的与需要

在外语教材的编写中要重视西方文化和语言对象国的文化，还与外语课程的设置和外语学习的目的有关。外语学习的目的是了解和学习目的语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满足专业学习和工作需要。如果外语教材中没有关于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和社会内容，大部分是中国文化内容，就违背了学习外语的初衷。学习外语的目的就是要理解当代世界，而不是去理解当代中国，外国留学生才需要理解当代中国。

从语言学习角度看，外语教材不是语文教材，可以选择大量的中国文化历史内容。选择语言纯正、表达地道、原汁原味的内容是国际上编写外语教材的基本要求。

教材内容对语言学习有很大的影响。语言是文化的外壳，与文化紧密联系。语言的句法结构、修辞手段和话语语气都与所表达的内容和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种语言就是一个文化，一部汉语词典反映了中华五千年文化，而一部英语词典却反映了整个世界文化。”（蔡基刚，2021b）如果英语课堂上接触的都是中国文化内容，学生很可能学不到地道的英语表达。

Hyland 和 Milton（1997）对中国香港地区大学生的 900 篇论文和英国大学生的 770 篇论文中的立场态度表达进行了语料对比分析，发现香港大学生使用较多的加强语（如 *must*, *should*, *demonstrate* 等），远远高于英国大学生的使用数量，而委婉语（如 *might*, *possible*, *suggest* 等）却使用不足。Cao 和 Xiao 基于英语期刊论文语料库对比了中国学者与国际学者对委婉语和加强语这些立场标记语的使用情况，发现中国学者在立场表达中大多使用加强语，这不利于拓展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空间（姜峰，2019），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中国的话语文化在表达观点和立场时大多爱用“要”“应该”和“必须”等加强语。因此，中国学者的英语论文中加强语的使用比例远远高于国际学者。这种差异必然给中西方学术交流甚至政治外交带来影响。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只有多接触和了解西方文化，才能真正学好外语，更好地同国际同行对话，如撰写研究论文。如果我们的外语教材里都是中国文化和中国话语表达方式，如何实现有效的国际传播？

6 结语

外语教材要融入课程思政、中国故事和国家意识。但要改变原汁原味的原版教材，挖掘母语文化，坚持爱国主义教育，就要非常谨慎了。外语学习的目的决定了无论是教材内容还是语言都应该来自语言对象国，因课程思政需要而加入中国文化是值得商榷的。课程思政的核心是立德树人，而西方文化中也有反映这些普世价值的丰富素材。国际传播需要讲好中国故事，要向世界宣传中华文化，但并不反对西方文化、文学和科技的输入，也并不反对在课堂上介绍西方文化，以提升学生的国际理解力和国际胜任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强调外语教材中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立场是对的，但不能和介绍西方文化对立起来。

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对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与影视作品不同，教材具有输入的强制性，因此在提出外语教材内容选择的指导思想时一定要严谨。要对课程思政、国际传播、国家意识等有正确的理解，要警惕在课程思政背景下进行外语教材二次开发时出现与世界文化脱钩的闭关自守和民族主义倾向，要预见到这样的教材可能会培养出一批盲目自信、唯我厉害的接班人，而这与国家所强调的“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用欣赏、互学、互鉴的态度对待多种文化”，“以包容的胸怀构建和而不同的精神家园”是相违背的。

外语学习的目的决定了外语教材应该主要挑选语言对象国的文化、社会、历史、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内容，用原汁原味的语言进行教学，而不是理解当代中国和宣传中华文化。外语教学绝不能与世界脱钩，外语教师要明辨是非，因为他们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外语教材的编写越来越复杂，评判标准越来越多，如要融入课程思政内容，宣传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体现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等。实际上，外语教材编写的目的非常简单，一是要让学习者成为善良、诚信、谦虚、具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二是满足他们在专业学习和今后工作中对外语的需求。

参考文献：

- [1] Hyland, K. & J. Milton 1997. Qualification and Certainty in L1 and L2 Students' Writing[J].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 183-205
- [2] 蔡基刚. 2021a. 课程思政与立德树人内涵探索——以大学英语课程为例[J]. *外语研究*, (4): 52-57.
- [3] 蔡基刚. 2021b. 观两会：英语在中小学的主课地位与公民素质和能力的培养[EB/OL]. 光明日报, <https://new.qq.com/rain/a/20210307A02QDZ00>.
- [4] 蔡基刚. 2023a. 外语教学跨学科背景下的第六代大学英语教材探索[J]. *外语电化教学*, (1): 88-92.
- [5] 蔡基刚. 2023b. 中国高校校本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制定依据——兼论大学英语教学中通用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的定位[J]. *外语研究*, (4): 58-62.
- [6] 蔡基刚, 唐敏. 2008. 新一代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原则[J]. *中国大学教学*, (4): 85-88.
- [7] 陈坚林. 2007. 大学英语教材的现状与改革——第五代教材研发构想[J]. *外语教学与研究*, (5): 374-376.
- [8] 陈新仁, 杨金龙. 2021. 新时代外语研究者的国家意识构建刍议[J]. *当代外语研究*, (4): 22-28.
- [9] 黄林. 2005. 大学英语呼唤第五代新教材[N]. *现代教育报·教材周刊*, 07-25 (7).
- [10] 姜峰. 2019. 语料库与学术英语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1] 李荫华. 2011. 继承、借鉴与创新——关于《大学英语》系列教材（全新版）的编写[J]. *外语界*, (5): 2-8.
- [12] 王晓莉, 胡开宝. 2023. 课程思政、英语应用能力与语料库技术“三位一体”的《新时代大学应用英语》[J]. *外语界*, (3): 9-15.
- [13] 卫昱. 2023.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的实践与探索[J]. *出版参考*, (5): 57-59.
- [14] 杨枫. 2022. 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时代困境、内涵结构与实践路径[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 92-96.
- [15] 杨金才. 2020. 新时代外语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几点思考[J]. *外语教学*, (6): 11-14.

（责任编辑：于 涛）

本期学术论文英文题目及摘要

Metonymy: Recursive Speech

Xu Shenghuan

Abstract: Metonymy is an old rhetoric speech. This paper focuses innovation and high quality with the aim of development, so as to make it an innovative research of metonymy in the aggregation of processes of the research. The generation of metonymy relies on recursion. The expression of metonymy might be analyzed by the theory of referring to a thing by its particular feature. The philosophical generalization of the negation of negation might also be made in 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metonymy.

Keywords: metonymy; aggregation of processes; recursion; the theory of referring to a thing by its particular feature; the negation of neg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Gener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Reflection and Question

Cai Jigang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cademic course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undergone the new development to focus o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Chinese elements and replace the texts about western culture, history, soci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Chinese culture so as to cultivate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ese nation, history, society, custom and language. This, however, might bring about the change of the nature of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s as well as the traditional way of writ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We suggest that using more materials of western culture in college English textbooks is appropriate in terms of the purposes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t could enhance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global understanding and global competence to satisfy their needs of academic studies as well as English proficiency.

Keyword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hinese cultur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lobal understanding

Goal-directed Communication, Decision-making and Adaptation: The Role of Orbitofrontal Cortex in Language and Speech Processing

Jiang Xiaoming

Abstract: 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studies in neurobiology of language demonstrates the central part of peri-Sylvian network is involved in language and speech func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ocus on the role of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OFC) which is primarily involved in goal-directed adaptive behavior. There is increasing evidence that the OFC is involved in language and speech tasks. It demonstrates that not only the linguistic tasks that involve the processing of socially, pragmatically and emotionally relevant information engaging OFC and its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 but also certain receptive and expressive language performances rely on certain neuro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is region, which in many cases demand executive functions. The OFC plays a relevant role in the adaptive neurobiological func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 complement and interplay with the language-unique processes to achieve successful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in the changing communicative contexts.

Keywords: uncinate fasciculus; OFC; peri-Sylvian network; social cognition; neurobiology of language

On the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Hu Tiesheng & Zhang Lifeng

Abstract: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spiritual wealth, and it is also the product of Western capitalist cultu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high-level talents for building a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teaching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to maintain cultural security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undertakings. It is the basic guarantee of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to improve the teachers' political quality by the ways of participating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activities, understanding cutting-edge research trends, and applying their research results 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so a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cultural power put forward by

110